

抗战铸就不悔人生^①

讲述者

郭光（1928— ），出生于中山槎桥，1942年参加革命，曾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民权队战士，解放后在中山汽车站工作，历任理货员、售票员、办事员、站长，1979年外调拱北汽车站任站长，1989年在珠海离休。



郭光

目睹日军暴行后参加革命

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山人。10岁那年父亲去世，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姐妹5人长大。我是长子。中山沦陷后，原本拮据的生活变得更加凄惨，生命时刻受到威胁。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许多烧杀掠夺的暴行。日军进城前便已出动战机前来轰炸和扫射，印象中中山电厂就被炸过。村里妇女被鬼子奸污的事时有发生。那时我妹妹刚出生，村里常有年轻或者刚结婚的妇女，将自己的脸涂黑，到我家借我妹背着来掩护。当时街头随处可见老百姓的尸体。石岐华佗庙附近常有大量饿死的尸骨。有一辆黑箱车专门将这些尸体装运至涌鱼洋万人坑掩埋。我家剩爷爷守屋，穷得饭都吃不上，经常捡拾别人家收割完的稻谷，煲粥填肚子，有时连粥都没有，只能在晚上到甘蔗园捡人家砍完剩下的甘蔗充饥。耕田还要交期租，我们连吃都成问

^① 根据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4月25日采访郭光整理。采访者黄春华、李丽静、吴炜娟；林伟桦、吴炜娟整理。采访地点为中山东区郭光家中。

题，根本交不起期租。2个弟弟饿死了。那时我虽小，但日军暴行在幼小的心灵刻下了烙印。对鬼子的仇恨带给了我力量。

1942年13岁时，在表哥引领下我参加了革命部队。我的大舅看到我们孤儿寡母过得如此悲惨，就接我们到他家（张溪），在那边谋生。我们靠抓蟋蟀卖给人喂养鸭子，维持生活。大舅有个儿子，即我的表哥，叫杜金泉，参加了杜广中队。他看我食不果腹，就把我带到部队参加了革命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和一名战友去大涌运枪从水路返回途中，在渡头被“大头王”雷洪（花名“大胆洪”）抓了。准备枪毙时两人跳下了水。表哥被铁线死死缠住，不幸淹死，成了烈士。他的战友游过河对面成功逃跑了。

到部队后，我一开始参加杜广小队。部队打着“国民党特务小队”的旗号，有几十号人，驻扎在张溪、岐头附近一带。驻地四周都是“大天二”。1943年，转移到二区（现沙溪一带）。那边也有“大天二”，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。当时附近共产党的部队有3个中队：黄石生中队、周增源中队、杨子江中队。1943年3月，三个中队共100多人整合为一个中队^①。杨子江是华侨子弟，他将自己的田地和房产变卖，支持革命，所以在部队的威信很高。我们主要任务是在沙溪一带维持治安，刚开始时跟“大天二”井水不犯河水。1944年4月的一天^②，一名叫彭河的队员叛变，诱约黄石生到沙溪桃源酒家把他杀害了。



黄石生（1916—1944），字冠华，中山沙溪塔园村人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二区中队中队长。

1943年至1944年间，我参加了攻打沙溪伪警察所战斗。攻打前，我们做了长时间的侦察工作。作为侦察员之一，我装扮成菜贩子，一边卖菜一边收集情报、观察伪警察所动静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，

① 即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二区中队，中队长黄石生，指导员杨子江，有队员120多人。

② 具体时间为1944年4月12日。同时牺牲的还有警卫员杨北可、苏伟棠。

我们选择在一个雨天出击。我们攻进去时，刚好撞上两个门卫在伪警察所门口交班，立即解决了他们，然后直接冲进去，发现里面还有人在睡觉，直接缴了他们的械。当时我们只有5颗子弹，子弹带都是用纸塞进去假装是满的。我缴了十几支枪，伪公所人员投降后放他们回家了。起初，我们收到情报说伪警察所长在里面，但是被他逃跑了。

突围挺进五桂山

1944年初，“挺三”发现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，企图“围剿”我们。部队通过我党领导的民主乡政得到情报后，迅速组织100多人，经港口突围至鳌溪，再进入五桂山。突围当天，老百姓为我们找来一批小船，一条船搭乘十个八个，分了好几批运人。当时有许多日军驻守在港口闸。闸口有炮楼，配有探照灯。突围之前，部队部署随时准备战斗，机枪就藏在船头。鬼子的探照灯不停扫照，一被照到就会被发现。行动必须赶在天亮前，因为特务很多，天亮后容易被察觉。日本鬼子一般不出动，但看到游击队肯定就打。之前我们在濠头收税时，常能看到有一两个鬼子兵。上级交待不要跟他们打起来，怕连累那一片的农民。转移时，得到民主乡政的大力帮助，小船一条接一条，沿着河边慢慢通过。最后，部队顺利挺进五桂山，编入民权队。

进入五桂山后，我驻守鳌溪税站，任务之一是检查过往车辆，阻吓伪职人员。当时有很多伪职人员搭乘岐关公司的车从税站通过。岐关车队的司机跟我们有联系，一般遇有大量敌人在车上，司机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就会打车灯，暗示车上有势力强于我们的敌人。我们就直接让车通行，不作阻拦。有一次，我们接到情报，伪四区区长何文中乘车经过。抓捕时，我们在路边叫他们缴械，遭来强烈反抗。我们的装备差，几支枪打不响（当时大多数枪是自己重新做的，性能很差），最终被他们逃跑了。我一个战友杨三追敌时，被敌人用枪捅穿车后玻璃打中了手。

在五桂山，我还担任侦查工作。两次抓捕麻子乡梁洪的行动中，我们都做了长期的侦察。梁洪是濠涌（榄边）一带的“大天二”。第一次得到情报，说他在家里，我们发起围攻，不料他从厨房的房顶跳到地面逃走了。第二次在麻子村十顷，他在田里搭了一个大棚，晚上住，早上回。经

过半个多月的侦察，有一天我们在他进村时实施行动。我们的同志躲在村庙旁边的山坟旁，有两挺机枪。当时我们一个小队长，见天色已晚心里焦急，身上的枪被梁洪的羽翼发现。他们发现后，便四处逃跑了。两次抓捕梁洪都与他失之交臂（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被抓住枪毙了）。

五桂山的群众很拥护我们。战士有什么不舒服，他们就会煲一些凉茶给我们喝，以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这样对我们是很难得的。我们有时还隐蔽在群众家里。日本鬼子来五桂山扫荡时，他们进我们出。有时在光头山上，我们就躲避在山与山之间的水坑里。日军的马队过来看不到我们，就用枪乱发扫射。

转战博罗勇负伤

1945年5月间，由于革命形势需要，上级决定珠江纵队一支队转移至东江。我参加攻打博罗长宁伪公所那一场战斗，至今记忆犹新：当时为了解救被伪军抓住的一批农民，我们负责攻打炮楼，东江部队负责攻打设在祠堂的伪公所。炮楼脚下有一条河，旁边种满竹子。当时天气很冷（大概十月、十一月份左右）。我们本想通过竹子爬到上面，但没成功。从炮楼底下往上看，只见伪军在抽烟，但就是攻不上去。后来改变作战计划，与东江纵队一起攻打伪公所。针对伪军把守的祠堂栅栏又高又坚固的情况，我们先安排一组长枪组在外面作掩护，接着几个小鬼队员摸上栅栏爬了过去，爆炸组紧跟在后。结果将他们的门户炸了，里面两个神龛的门都炸飞了。我们一举冲了进去，解救了被抓在里面的农民。伪军从祠堂后面跑掉了。

在东江博罗长宁镇战斗时，我右腿被子弹射中，有些子弹碎片至今没有拿出来。我记得当时有4个人受伤。除腿伤外，我身上还有其他多处伤口。我躺在床上休养了两个多月。当时没有止痛针，只能拿一些绷带把伤口的脓清理出来，奇痛无比。有一次痛到把帮我料理伤口的护士一脚踢开。部队领导还为此写了纸条让我配合治疗。

部队从东江北上时，由于身体和人员需求等原因，我最远只到了龙门，1946年便回到中山。后来安排在一区武工队，主要还是搞侦察。那段时间情况十分恶劣，五桂山很少人，多数人都是在各区做侦察工作，等待革命形势明朗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形形色色的“大天二”

中山沦陷时期，有一些封建式地主武装，盘踞在沙田及民田区一带，走私、开烟赌馆、勒收田赋，无所不为，被中山人民称为“大天二”，如吴金驻守民众，梁彩驻守其家乡横栏，梁自带集匪于浮圩，潘惠（高佬惠）驻守大岗潭洲，梁正聚匪于大黄圃等。比较出名的是“民利公司”和“挺三”等。他们都是或挂着为民旗号，或领取国民党番号，却消极抗战。

抗战爆发后，中山三、九区地方团队招兵买马，扩充队伍。1940年7月改编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挺进第三纵队，同年10月改编为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，即“挺三”，司令袁带，副司令屈仁则。1944年后为伍蕃接任。

“民利公司”是沦陷初期中山三区、九区的地方势力潘惠、梁自带等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堂口。后来为巩固地位，潘、梁等各自在“挺三”领取番号。这支队伍军纪散漫，每个部队均设有赌档，对抗日的态度非常复杂，有的较为积极，有的略为消极，但又不致投敌，极个别的则投靠了日本人，挂上伪军的招牌。

“挺三”活动地域是中山、顺德全部，鹤山县大部份，新会县一部；直属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，配属于国民党六十四军。“挺三”司令部下设参谋室、副官室、军需室、无线电台、有线电通讯队，中山指挥所、顺德指挥所。中山指挥所由屈仁则、顺德指挥所由林小亚分别负责指挥所在地暂编部队的一切事宜。暂编部队的总人数约为6000多人。驻守在中山的共有七个支队。

第一支队长潘惠（又名高佬惠），活动于中山九区小榄一带。其中由我党实际领导的梁伯雄大队，下属于它，实际番号为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。

第二支队长吴金（又名烧猪金），活动于中山石岐一带。

第三支队长梁自带（又名自带仔），活动于中山三、四区一带。

第四支队长梁正，也活动于中山三、四区一带。

第五支队长屈仁则（又名佛爷，副司令），活动于中山三区小榄大拗、东风一带。

第六支队长萧天祥（又名黑骨祥），活动于中山二区一带。

第七支队长梁渭祥，活动于中山八区一带。

（综合整理）